

# 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理论：以布鲁默为中心的考察<sup>\*</sup>

张庆熊

**摘要：**符号互动论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传统，它把米德有关自我身份通过社会角色而确立的观点和杜威有关理论作为解决生活问题工具的观点应用于社会研究。符号互动论一方面看到了自我以及意义解释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想坚持社会理论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性地位。这要求符号互动论能够发展出一种把“意义解释”与“经验检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路线。然而，这是一项很难贯彻落实的事情。布鲁默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人物，以其为中心来阐述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前提、社会观念、方法论步骤及效应，可以发现尽管符号互动论提出的解决方案还很初步，但它的构想当代社会理论的转型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发酵作用。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布鲁默；意义解释；经验检验

**中图分类号：**B08；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4) 04-0013-11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4.04.013

**作者简介：**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是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兴起于 20 世纪中叶，以芝加哥大学为活动重镇，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传统，把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有关自我身份通过社会角色而建立的观点和杜威 (John Dewey) 有关理论作为解决生活问题工具的观点应用于社会研究。

赫伯特·乔治·布鲁默 (Herbert George Blumer) 是符号互动论的积极推动者。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米德的助教，深受米德的影响，致力于发扬米德有关自我、社会角色、符号化的行为交往的学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是他在 1937 年发表于《人与社会》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和使用的，后来成了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的一种学术观点和方法论的“标签”。<sup>①</sup>按照符号互动论的看法，人的社会行为受到以符号互动为中介的价值观念和意义的指导，因此社会学说必须把符号互动和意义解释当作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当社会理论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自我和人的意义理解时，社会理论的真理性 and 普遍有效性如何才能获得保障呢？符号互动论一方面看到了自我以及意义诠释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想坚持社会理论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性地位。布鲁默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写道：“我坚信，一门经验科学必须尊重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的性质。在我看来，符号互动论显示了对人类群体生活及其行为的性质的尊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新形态及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7JZD041）的阶段成果。

<sup>①</sup>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1.

重。但是，这种尊重反过来又需要发展一种与所研究的经验世界的性质相一致的方法论视角。”<sup>①</sup>这要求符号互动论能够发展出一种把“意义解释”与“经验检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路线。然而，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符号互动论是否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呢？这是评价符号互动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的关键所在。

正如布鲁默指出的那样，符号互动论是一个“标签”，它名下囊括了众多具有类似的方法论倾向和学术志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按照布鲁默的看法，他们包括米德、杜威、托马斯（W. I. Thomas）、帕克（Robert E. Park）、詹姆斯（William James）、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沃思（Louis Wirth）等一大批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其中为该理论奠定基础 and 做出直接贡献的佼佼者则首推米德。<sup>②</sup>就思想倾向而言，他们大都具有实用主义思想背景或受其影响，他们主张社会现实是由行为者的互动所创造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他们关注符号互动在意义建构、自我意识形成和身份确立中的关键作用，他们寻求从社会生活的直接源头出发论证社会规范和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这个直接源头是行为者在社会生活中互动的关节点，而不是社会的功能结构，因而他们批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家把宏观设计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放在主导性位置而忽视微观层面上的行为者原创性建构的自发力量。

当然，细分的话，这些被贴上“符号互动论”标签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我们在此只能据其所要，找其代表性的观点和人物进行介绍。布鲁默在1969年发表了《符号互动论：视角和方法》一书，这本著作堪称有关符号互动论最清晰的理论陈述。该书除了把他多年来所写的有关符号互动论的文章汇编起来之外，还包括他新写的一篇导论性的长文《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立场》（“The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sup>③</sup>该文系统地介绍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特征。这本著作不仅全面评介了米德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在符号互动论建设中的贡献，指出符号互动论与其他社会理论学派的主要区别，而且还反思了符号互动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下我们主要依据这本著作来评述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前提、社会理论、方法论步骤及其思想史效应。

## 一、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前提

布鲁默在《符号互动论：视角和方法》一书中阐明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前提。在他看来，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有其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它们看似简单，但至关重要。它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行动是具有意义的，意义不仅与作为对象的事物相关，更重要的是与使用符号的人的生活相关。对意义的理解不仅来源于当事人与其所处理的事物的关系，而且来源于当事人与其同伴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意义的理解有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处理事物的过程也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意义在此过程中发展变化。换句话说，布鲁默在“自我”通过“行动”朝向“事物”的结构中增添了一个“意义”的环节，并认为这个“意义”是经由符号互动解释的意义，这个“自我”是通过符号互动与群体相关的自我，这个事物是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因此，布鲁默想要阐发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就是以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前提为依据的。下面我们也按照这一顺序，首先介绍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前提。

布鲁默指出符号互动论归根到底立足于以下“三个简单的前提”：<sup>④</sup>

(1) 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朝向事物行动的。这意味着人的行动不是物

①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vii.

② Cf.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1.

③ Cf.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viii. 此书的这篇导论性长文已由霍桂恒译出，题目被译为“论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载于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的《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33—696页。

④ Cf.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2.

理反应那样的行动，而是富有意义的行动。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根据他们所理解的事物的意义而采取行动。意义不是客体所固有的。一个事物的意义是什么，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物理属性，还取决于它们与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这里说的事物包括人在世界中所可能注意到并加以理解的每一种东西。意义与作为客体的事物不能等同起来，人们是通过所理解的事物的意义而朝向客体行动的。一片树木花草可以被视为自然物，也可以被视为绿化植被；一个人可以被视为一位母亲，也可以被视为一位商店售货员。人们了解绿化植被而种植树木花草；人们在商店里知道某位女士是商店售货员而向她付钱购买货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于人的范畴，如朋友或敌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其外表可以是相似的大楼或一群人，如一所学校或者一个政府。尽管它们作为物理对象可能相同或类似，但它们作为人的行动所面对的对象的意义却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作为同一对象的人或组织机构，当其被视为朋友或敌人、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时，人们对其采取的行动也是大不相同的。

(2) 事物的意义产生于当事人与其同伴的社会互动。教师和学生的意义源于他们之间的教学互动；商店售货员与顾客的意义源于他们之间的销售和购买的互动；雇主是相对于雇工而言的，雇工是相对于雇主而言的。事物的意义是通过符号来标识的，符号的使用以及对其意义的理解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用什么符号标识什么事物，并非随心所欲，是使用符号的共同体互相认可的过程。对于事物的分类方式、评价标准、用法规则，当事人是在与其同伴的社会互动中进行学习和养成习惯的。分类方式、评价标准、用法规则不是先天的，而是人们在符号互动的行为中建立起来的。

(3) 人在与相遇的事物打交道时，会对事物的意义进行解释，并在此过程中处理和修改其意义。这意味着事物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与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也是其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的意义的过程。行动者不免根据处境的变化和新出现的问题重新审度事物，重组和调整其行动的方案和处理事物的策略，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解释和转化各种意义。所以，不应当认为行动者对事物意义的理解仅仅体现在对已经确立的意义的自动应用，而应把它视为一个形成和不断解释的过程。行动者不应把事物的意义当作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应把它当作指导行动的工具来使用，并在行动过程中加以修正。

符号互动论的这三个前提看似极其简单和平淡无奇，但实际上是针对思想史上的两种根深蒂固的意义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是“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主张意义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从如此这般的事物中“滋生”出来的；另一种是心理主义的立场，主张事物的意义是一种“心理的添加物”。<sup>①</sup>在符号互动论看来，这两种意义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事物的意义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建立在“行动”“社会”和“解释”的三个前提的基础之上的。这里包括三方面的互动关系：(1) 人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2) 人与同伴之间互动协调的动态关系；(3) 人的意义解释与人的行动方案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符号是必不可少的媒介，正是借助符号这个媒介，人与事物、人与人之间才建立了互动关系。因而，把事物的意义归于纯客观的因素或纯主观的因素的思路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事物的意义源于人朝向事物的符号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

## 二、符号互动论的自我观和对社会的基本看法

布鲁默主要借助米德的观点来论述符号互动论的自我观和对社会的基本看法。米德在芝加哥大学讲课时阐发了社会行动和语言交往在心灵、自我、社会角色和社会体制形成中的作用。在米德看来，“我是谁”与“谁是我”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人怎么认识我”与“我怎么认识他人”，这两条认识的途径是互相关联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和自我的社会角色的扮演，是合而为一的过程。米德有关自我的学说深刻地动摇了先验主义的自我观。米德从微观环节论证符号互动在人的意义理解和社会行为规范建构中的作用，这与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帕森斯所倡

<sup>①</sup> Cf.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4.

导的宏观的结构功能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布鲁默把米德的观点串联起来，建立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理论。概而言之，它包括如下五个核心观点：

(1) 社会作为符号互动的行动的总和。人类社会应该被看成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社会与其说是人的群体，毋宁说是人的行动的群体。社会互动是指至少两个个体相互行动，相互关联。他们彼此互动，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为，不断地表明他们的行动意图、行动方式及对情况的理解。他们彼此解释对方的所作所为，从而认定对方是一个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反过来，他们通过对方的反应来认识自己是谁，确认自己在共同的社会行动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社会行动的单位可以是独立的个人，也可以是代表一个机构行动的组织。但无论是作为个别的行动者，还是作为机构的行动者，只要是社会行动，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符号的互动”。

(2) 人类是拥有自我的有机体，可以形成一种应对周围世界的自我互动机制。社会中的人不应被视为机器中的零件或生物机体中的器官，不应仅仅按照社会的结构功能来解释人的社会生活，因为人具有自主性。人类可以感知自己，对自己有概念，与自己说话，与自己沟通，向自己发出指示，告诉自己应该“做这个”或不应该“做这个”，为自己设定目标，向自己妥协，计划自己要做的事情。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行动，人类个体都不是仅仅为了服从整体的结构功能而行动，而是通过向自己指出其在特定情境和行动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不同之处来行动。一个人必须注意他想做什么，他是如何做的；他必须向自己指出那些可能对他的行动有帮助的条件和那些可能阻碍他行动的条件；他必须考虑到在他所处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要求、期望、禁忌和威胁。一个人的行动是通过这样一个自我指示的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人类势必对周围世界中所相遇的东西进行判断、分析和评价，需要计划和组织他们的行动，并需要通过预期行为的结果而考虑一系列可替换方案，从中加以选择。简而言之，人类因拥有自我而改变了与世界的被动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与世界相遇的自我互动机制”。<sup>①</sup>

(3) 自我认同是符号互动的交流过程。自我认同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单方面的结果。人固然有自己的愿望、态度、感觉、想法，但仅凭人的意识行为还不足以确立人的身份标识；人固然面临环境压力、外部刺激，但这些外部力量还不足以让人认识到我是谁的问题。自我的身份是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意识到对他分配的任务，意识到一个命令，意识到他要承担的某种责任，意识到他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或协作，意识到他喜欢或不喜欢与某类人一起工作或休闲，意识到他在做一些适合自己在家庭或工作中的位置的事情时，他的自我认同的身份才建立起来。身份是情境定义的产物。没有身份本身，只有人们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彼此定义的身份。从根本上说，每个人都是在符号互动的关系中使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行动保持协调一致，即使有分歧也要在符号互动中寻找解决办法。“自我认同”不是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自我是在意识到作用于他我的行动中意识到自己的主我的，并且也在他我作用于自身的行动中实现了米德所说的“自我”具有“主我”和“宾我”两个位格，“自我认同”取决于自我在符号互动的人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4) 人类用语言符号解释或“定义”彼此的行动。人类个体聚在一起，通过考虑不同的事物并解释它们对自己未来行动的意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人类的互动并不是直接对一个人的外部行动做出的，而是基于他们与这些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因此，人类的互动是通过符号，通过解释，通过赋予行动以意义作为中介的。“这种中介相当于在人类行为的刺激和反应之间插入了一个解释的过程。”<sup>②</sup> 社会行动是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用于解释的符号包括有形可见的符号（如白旗、握手或鞠躬），也包括抽象的文化意象符号（如宗教的十字符、医疗救援的红十字符、“和平鸽符”等）以及文字概念（如“停止”“求救”“和平”“自由”等）。行动者通过

<sup>①</sup>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62.

<sup>②</sup>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79.

使用语言符号传递和解释彼此行动的意义。

(5) 社会体制和社会规则是在符号互动中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当然，符号互动论承认社会制度和社会规则的存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但符号互动论强调只有当人们在符号互动中建立和维护这样的制度和规则时，只有当人们服从和遵循这样的制度和规则时，它们才能成为一种社会现实而发挥作用。规则是由共同生活的社会过程创造和维持的，而不是反过来，规则创造和维持了共同生活。符号互动论持一种动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生成观，它不是把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当作静态结构中的东西加以分析，而是把作为行动者的社会成员如何塑造他们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和能力放在社会考察的中心。符号互动论还主张，已确立的社会模式的持续存在状态依人们反复使用同一形式的解释而定。离开了人们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构、遵循和解释，任何社会模式都不会产生和存在。只有持续使用相同的解释方案才能维持群体生活的既定模式；而这些解释方案只有通过行动者在符号互动中彼此的界定和互相不断确认才能得到维持。既定的群体生活模式不能靠本身的结构继续下去，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是因为它们在群体生活运转中的不断解释和反复肯定中的连续性。一旦维持它们的解释广受质疑或受到重大破坏，这些模式就会迅速崩溃。有鉴于此，社会的变革也基于符号的互动。“在提出社会变革的命题时，明智的做法是认识到，任何这样的一种变革路线都是通过那些解释其所面临的处境的行动单位来介导的。”<sup>①</sup>

### 三、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立场和步骤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探讨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包括其方法论所持的哲学立场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步骤。

从哲学的角度看，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立场说到底就是实用主义的立场。但实用主义有众多的代表人物，其观点不尽相同。布鲁默的立场接近于杜威和米德，有一定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倾向，不像詹姆斯那样把人的经验看作纯粹主观心理的东西。这种自然主义的实在论既不把经验视为纯粹主观的心理现象，又不把经验视为纯粹客观物体的反应，而是将其视为主体的行为与客体的周围世界互动的产物。布鲁默强调，主体在周围世界中的行动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在此过程中解释在经验形成中起关键作用，而解释是一个符号互动的过程，因而经验世界不是纯粹客观的，是赋予了人所解释的意义的世界。布鲁默用“执拗性”来刻画“实在性”(reality)，认为经验世界具有的“执拗特征”(the obdurate character)，人们必须尊重这个经验世界所具有的执拗特征，所以需要承认其“实在性”。<sup>②</sup>但他同时又指出，经验世界不是以某种终极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永久不变的东西，而是在人与自然的符号互动中形成的东西，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总有新的东西产生。我们不应把经验仅仅视为重复的东西和过去知识的积累，经验是常新的，经验不断在符号互动中崭露头角。“经验科学的历史表明，经验世界的实在是通过‘这里和现在’(here and now)显现出来的，并且是通过各种新发现的成就而不断得到重塑(recast)的东西。”<sup>③</sup>

布鲁默表明他提倡的符号互动论既反对唯意志论的或心理主义的立场，又反对僵化的实证主义的或绝对客观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符号互动论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必须遵从经验科学的事实；经验世界并不是人能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的，它常常违背人的主观意愿，执拗地按照它本来的方式运行；经验科学的理论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要注意根据新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正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布鲁默又认为，经验世界不是按照一成不变的固有的方式运行的；经验世界是各种条件和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这些条件和因素都会随时随地而变化；尤其在社会世界中，符号互动将促使人的社会行动和对社会意义的理解发生改变，从而改变现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因此，那种认为一旦发现了客观规律就能一成不变地把握客观真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种在研究人类社会

①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89.

②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23.

③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23.

历史时企图把人的主观因素悬置起来，而仅仅寻求制约人的主观因素的客观规律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任何理论都不是永恒的真理，必须根据新发现的问题和新的社会研究的资料随时修正已有的理论。应该把理论当作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把理论当作教条，当作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这就是布鲁默所提倡的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的基本立场。

布鲁默按照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来阐释他提倡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步骤。这一步骤包括以下内容：<sup>①</sup>

(1) 掌握和使用先前已有的有关经验世界的图式或方案从事研究。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认识世界的图式和处理世事的方案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图示和方案凝聚着过去的经验，包含着对经验世界的基本结构和本质内容的看法。我们在处理当前世界中的事务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先前已有的世界图式，并需要了解和应用先前已有的知识去制定方案和从事研究。然而，我们不可以把它们当作一成不变的灵丹妙药，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处理事务的结果来审视这些先前已有的图式和方案是否正确。以往的经验积累和知识为我们从事新的研究提供了前提，而真正的方法论研究所无法避免的任务就是要识别和评估这些前提。

(2) 提出有关这个经验世界的疑问，并且把这些疑问转化成问题。我们在经验世界中的行动遇到了障碍，我们的任务执行得很不顺手，我们对已有世界的图式、方案和知识产生了疑问，这些构成了新研究活动的开端。显然，这些疑问提示和指引着我们此后的研究路线。从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可以大致确定问题是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方法论者来说，谨慎细致地考察问题和清楚地表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确定问题和选择表述问题方式的过程中出现的浮夸肤浅的态度和盲目尊奉教条的因循守旧的做法，构成了经验科学中人尽皆知的祸根。

(3) 确定应当寻找的材料和收集材料所使用的手段。这里涉及材料与问题的关系。显然，材料是由问题确定的，研究者根据问题去搜集材料。但是，即使材料是由问题确定的，人们也需要持续不断地考察材料，以弄清它们是要求修改这种问题，还是要求拒斥这种问题。这表明材料相对于问题要符合恰当的特征。不恰当的材料会模糊问题或歪曲问题，而只有恰当的材料才能成为揭示问题或拒斥问题的关键。此外，需要认识到用于获取材料的手段是否恰当，对于获取恰当的材料也很重要。在持有偏见的地方去收集材料，或用误导的方式做所谓的问卷调查，就会把调查研究引向错误的方向。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或理论而去收集材料，则会使真正的经验研究失去意义。这表明研究者需要采取端正的态度，谨慎细致地寻找合适的手段去收集材料，并批判性地考虑材料与问题之间的关系。

(4) 确定材料之间的关系。由于科学理论的重要功能是预言，而预言依赖于掌握数据之间的相关联系。一旦发现和确定了数据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就能根据一组变量预言另一组变量，从而诞生科学研究的结果。因此，了解这种材料之间的联系是如何达到的，是非常重要的。无论这种联系是一个人通过明智地思考而获得的，还是他在收集和储存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依靠诸如析因分析之类的程序或计算机的处理方案而获得的，仔细地复核这种相关联系是否确实存在和恒定存在，或在多大概率上存在，以及弄清楚它们的发生还受到哪些条件因素的影响或干扰，这对于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5) 解释新发现。这是上述一系列研究的收尾阶段的步骤。对新发现的解释会使科学家超出他所研究的问题的原有范围，因为在做出各种解释的过程中，他势必会把他的发现与某种外部解释力更大的理论体系联系起来，或者与某种超越他所做的研究的观念组合联系起来。这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常有的事，如把潮汐现象与万有引力联系起来。就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而言，这重要的最后一步尤其值得从方法论角度仔细推敲。因为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理论繁多，其中许多理论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科学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把他的发现与这种或那种流行的理论联系起来，而这样

<sup>①</sup> Cf.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p.24-26.

的理论可能是未经过充分验证的，也可能包含被掩盖的错误的。尽管他以前的研究做得很好，而最后进行解释和总结的一步如果错了，那么整个结论就都是错误的。

(6) 注意概念的使用。在整个科学探究活动中，概念起着核心作用。学者从事经验世界研究的最初方案中总是已经包含概念的元素。研究者提出问题要使用概念，寻找数据和将数据分类要使用概念，建立数据之间的关系要使用概念，此外，概念还是解释研究结果不可或缺的定位点。由于概念在科学探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尤其需要对概念进行方法论上的仔细推敲。

为加强理解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步骤，我们可以把它与杜威提倡的“探究五步法”做一比较。从表面上看，一个是六个步骤，另一个是五个步骤，但其实这里的差别并不大。因为布鲁默的六个步骤（可简称为六步法）中的最后一步“注意概念的使用”涉及探究的全过程，因此实际上也是五步法。杜威五步法中的第二步“设立问题”与布鲁默六步法中的第二步“提出有关这个经验世界的疑问，并且把这些疑问转化成问题”的含义大致相同；杜威五步法中的第三步“确定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第四步“推理”与布鲁默六步法中的第三步“确定应当寻找的材料和收集材料所使用的手段”和第四步“确定材料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合并起来的内容上看，也有类似之处。杜威五步法中的第五步“事实一意义的可操作特性”与布鲁默六步法中的第五步“解释新发现”，粗略地看，讲述的都是对新发现的理论的意义解释和验证。

当然，在杜威和布鲁默之间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别的。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的立场在总体上是一种偏向于实在论的实用主义立场，因此从总体上说与杜威的自然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差别不大。但是，毕竟布鲁默特别强调符号互动的的作用，所以他在其六步法的第一步申明“掌握和使用先前的有关经验世界的图式或方案从事研究”，因为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探究的先行条件总是符号互动的世界，人类在处理当前世界中的事务时不可避免地需要掌握和使用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概念框架去制定方案。杜威则强调“不确定的情境”，认为这是激发人的问题意识的处境条件，人们只有当遇到问题后才会怀疑原有的知识理论和行事方式。我觉得他们各自会强调自己观点的优先性秩序，但未必会否定对方的观点。另外，布鲁默强调，新发现的事实及其量化关系需要与符号互动中的其他理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和考察，这里涉及众多的理论，而不仅仅涉及单一的理论；一个理论的证实或证伪并非仅仅取决于单一的实验事实，而且还涉及解释的可能性以及理论在符号互动中被接受的程度。这在社会理论中尤其明显，因为存在着形形色色互相竞争的社会理论。不同的社会理论家使用着他们各自中意的概念，他们所建立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力度，但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面对这样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学者尤其需要注意如何解释自己的新发现，如何使用恰当的概念表述自己的新发现。

布鲁默主张，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原理必须满足经验科学的各种基本要求，从经验性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为有关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的知识提供一种可证实的研究方法。然而，符号互动的方法仍不能等同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穆勒等学者的早期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在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中贯穿着意义问题，而有关意义的概念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经验材料及其逻辑分析。用有关社会现象中可观察的记录语言，配以逻辑的归纳和演绎，不足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问题。再说，人类对意义的理解是通过群体之间的符号互动而实现的，这要求我们不能仅仅采用局外的旁观方法，而必须采用符号互动的参与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的那条立足于外在观察、逻辑分析和实验验证的路线就行不通了。因此，布鲁默主张，社会研究者应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事调查研究。虽然社会研究者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也需要使用各种高技术含量的调研程序，但是它们都是为调查研究服务的，它们都要经受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检验，随着调查的深入和认识的加深，就需要及时调整不适当的概念并修正理论。这些理论、模型、概念、技术和规程不应成为压制研究的方式，应成为促进研究的手段。因而他一再重申：“人们所需要做的，是获得那些包含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前提、问题、材料及其联系线索、概念及其解释的经验验证（validation）。通向这种经验验证的道路不在

于操弄探究的方法，而在于对经验社会世界的检验（examination）。”<sup>①</sup>

#### 四、符号互动论的时代背景、现实意义和遗留问题

符号互动论的兴起有其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学已不像初创时期那样在为赢得自己的学科地位而奋力拼搏，而是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并戴上了科学的桂冠。然而，社会学因涉及人的主观愿望、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传媒舆论对人的行动的影响，不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便于采用实验的方式获得证实或证伪，即便有社会调查研究经验材料和统计数据，也存在多种多样解释的可能性。究竟何种解释更有说服力、更加有效，这在社会学界常常成为众说纷纭的事情。社会理论往往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成了一种在哲学化理论与科学的经验理论之间界线不甚清楚的东西。社会理论界很热闹，各种各样的学派互相竞争，它们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并且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度，都占据了一定的学术市场，获得了一批拥护者。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研究者该怎么办呢？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布鲁默发觉，当时的社会学界存在两个问题：（1）是从经验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社会研究，还是允许既成的社会理论、模型、概念、技术和规程来强迫社会研究？（2）在社会调研过程中，当遇到不同的文化世界和不同的概念符号系统时，该怎么办？这样的调查研究本身是不是一种符号互动的行为？这种符号互动会不会影响调查研究的客观结果？

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在实际的社会调研中却不易处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理论当然是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让社会现实迎合理论。然而，当我们从事社会调研时，总是已经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理论，我们不免要带着已有的社会理论并在其影响下从事社会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研究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学者常常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上的偏好，或学派传承和学术上的偏好，选用一些自认为政治正确的、时髦流行的，又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概念，如权力、异化、社会整合、功能需求、“民风习俗”（mores）、“文化剥夺”（cultural deprivation）等，为他们的课题设计博人眼球的研究方案，而他们对这些领域却并不怎么熟悉，甚至带有偏见。课题设计者往往标榜自己的调研方案是科学的。他们热衷于构建各种逻辑和数学模型，配以复杂高深的各种研究技术，诸如输入—输出分析、系统分析、随机分析等等。然而，他们的这些调研设计方案经常不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而是为了其他功利的目的。这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容易受到追捧，但往往收效甚微，因为这种研究方式离开了对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切实考察，而偏爱时髦的理论图式、预先设计的模型、花哨而模糊不清的概念。布鲁默指出：“当前流行的倾向和实践是允许理论、模型、概念、技术和科学规程来强迫研究，从而扭曲对经验世界的分析描述，以适应它们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社会和心理科学中的许多科学探究实际上是在搞社会哲学。”<sup>②</sup>

在布鲁默看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案都必须以人类活生生的群体生活作为源泉和归宿。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就是日常经验的世界，是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社区经常要面对和处理的现实问题。例如，一个少年团伙的斗殴事件、一场学生骚乱事件、一个种族群体与警察之间的对抗事件、一个实业公司管理层所发生的事件、一个在天主教教士中间所发生的事件等。它们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中发生。社会研究要去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并不熟悉这样的生活处境，他们对这些生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们的立场几乎总是一个局外人的立场。但是，他们往往觉得自己很有学识，只凭少数几条线索，就轻而易举地编织调查研究的材料，形成调查报告。布鲁默指出，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这种情况不是个案。为谨防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人类鲜活的群体生活是一切社会理论的源泉和归

<sup>①</sup>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34.

<sup>②</sup>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34.

宿，我们要从经验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社会研究，不能被刻板的理论模型和先入之见的意象牵着鼻子走。

第二个问题较为棘手。社会调研工作当然也是一项使用概念符号的工作。社会调研者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符号。他们的概念符号来自他们所中意的社会学理论，他们要使用这些概念符号去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他们要使用这些概念符号去进行社会问卷调查或访谈。被调查群体也有自己使用的一套概念符号；在社会的主流文化群体和非主流文化群体之间，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在住花园别墅的富豪和住贫民窟的穷人之间，形成了极为不同的世界，他们各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符号，表达他们各自特有的情感和意象，反映他们各自不同的经验世界。布鲁默主张要深入被调查群体的社会生活，要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要抱有同情心地理解被调查群体的思想感情和概念符号。旁观者如雾里看花，看不清楚，获得的知识必然有限。参与与其生活中去的研究者将拥有更多关于它的知识，也更容易体验到被调查群体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特别是当调研的对象涉及亚文化的社会群体时，调研者容易居高临下，视自己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为科学先进的，视被调查群体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为愚昧落后的，这样不容易了解被调查群体本身对他们的生活处境及其意义的理解，因此需要学会换位思考。

布鲁默的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美国流行的现象学社会学和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主张差不多。然而，他们之间在观点上又有所区别。简单地说，现象学社会学和俗民方法论更加强调查群体本身对生活意义的内在理解和体验，而符号互动论强调调查研究本身是一种符号互动的过程。参与被调查群体的生活处境，尽可能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话语系统，是为了修正自己以前所持的调查研究方案及其概念系统。调研者会影响被调查群体对他们原有的概念符号意义的理解，被调查群体也会影响调研者对他们原有的概念符号意义的理解。一旦在调查研究中发生语言交流的行为，双方原来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及其生活意义的看法就都会有所改变。那种原封不动地保留原住民的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理解的说法是不现实的。在调查研究中，一方面要尊重原住民自己的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理解，另一方面要善于修正对自己原有的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的理解，如此才符合符号互动的实情。在布鲁默看来，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于弄清什么样的互动形式正在发挥作用，而不是把某种预先确定的观点和方案强加给这个领域。在交往过程中，互动总是会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其变化取决于进行互动的伙伴所遇到的情境。“无论情况究竟如何，社会互动的形式都是一个应当根据经验加以发现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应当提前加以确定的问题。”<sup>①</sup>

布鲁默认为社会调查是一个“探索”（exploration）和“审视”（inspection）的过程。在此不应安置固定不变的路线图和一成不变的规程。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展开和新材料的发现，要及时调整原先的方案和已有的假设，要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以求确证。这好比达尔文走进未知新大陆的丛林科考，他不仅要高度谨慎细致和诚实的探索工作，同时还要具备训练有素的想象力，根据新发现的物种资料创建和求证他的生物演化理论。布鲁默也喜欢把社会调查研究比喻为一种揭开帷幕的运动，一种从无知或蒙蔽状态走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更丰富、更精确的意识的运动。他写道：“我喜欢把它比喻为一种揭幕运动，即揭开那个掩盖或者遮蔽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帷幕。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揭开人们打算研究的群体生活领域的帷幕。无论在何种程度上，用预先形成的意象代替第一手知识，帷幕都不会被揭开。只有接近这个区域并仔细研究、深入挖掘，帷幕才会被揭开。凡是不鼓励或不允许这样做的方法论都违背了那条重视人们的经验世界之本性的首要原则。”<sup>②</sup>

布鲁默提倡的符号互动论方法论，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一种揭露时弊的效果。简单地说，当时的美国社会理论五花八门，课题项目和研究论文满天飞，但真正信得过的调查研究报告和能解决社

①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54.

②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39.

会实际问题的方案却少之又少。布鲁默呼吁，与其使用那些抽象难懂和离奇古怪的社会理论概念去高谈阔论，不如深入城市社区，采用贴近民众的语言来表达社会问题，如此才能更加确切地了解民众的生活，从而找到合适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芝加哥学派所做的许多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正是遵循了这条路线，如研究芝加哥城市中的贫民窟问题、少年犯罪问题、毒品问题等等。从这些角度看，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符号互动论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兼顾经验证实和意义解释，但在看上去面面俱到的背后也留下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理论界对符号互动论有如下几种批评：

(1) 符号互动论显得比较空乏，缺乏可操作性。符号互动论只是在原则上提出经验研究需要注意符号互动的问题，却没有明确提出经验观察与概念符号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没有提出在介入了符号互动之后经验观察的可操作方案。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研究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批判别人火力很猛，而自己还是停留在难以落实的要求上。符号互动论批评早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仅仅重视外在观察的研究路线。但拥护实证主义研究路线的社会学家会辩解道：我们不是不知道社会行动含有意义问题，只是一旦介入了概念的意义因素，那么社会行动的客观性如何才能得到保证？正是因为外在的观察材料、可感知的身体行动具有主体际的可观察性，大家都能观测，并且可以统计，可以量化计算，实证主义才主张以这样的观察资料和信息数据作为社会研究的材料，如此才能赢得经验科学的客观性。人确实具有主观意向和价值观念，但它们难以被观察和考量。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寻找那些影响人的主观意向和价值观念的可观察的物质现象，如自然条件、生活物资、生产技术和分工等等。一旦找到了这些物质因素与人的意义理解的关系，就能梳理出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律。符号互动论主张从微观的符号互动的环节考察人的意义理解与行动的关系，这样虽然能很细腻地描述个案，但很难梳理出社会总体上的规律性。涂尔干等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从整体论出发，考察集体意识与人的总体上的行动之间的关系，由此才能采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规律，从而对人的社会行动做出概率上较为准确的预言。韦伯提出“理想型”，认为只有建立理想型的模型，才能通过统计资料解释清楚理想型的价值观念与人的行动之间的相关联系。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原型经济人”和社会行为的博弈论模型，用于数据统计和决策预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也是从总体上研究人的社会现象，使得社会的结构功能类型与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益之间有一定的数据关联可考察。这些社会理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都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案。符号互动论虽然口口声声强调社会研究要重视经验世界的实在性，但却没有提供明确的可操作方案。布鲁默所提倡的“探索”和“审视”虽然用心良苦，但多少还停留在“揭开帷幕”之类的比喻上。

(2) 符号互动论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布鲁默等符号互动论者一方面坚持社会理论的经验科学性，主张社会理论的真理性要以事实检验为最终判据；另一方面又坚持社会理论要以对人的行为的意义理解为前提，而且这样的意义理解是随着符号互动不断变化的。他们认为，作为旁观者的社会调研是不够深入的，而作为参与者的社会调研又会与被调查群体发生符号互动，会影响被调查群体对概念的意义理解，乃至改变他们原先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理论的客观真理性何以保证呢？诚然，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符号互动的性质。关于这一点，许多社会理论家都是承认的。波普尔（Karl Popper）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反对历史决定论。他认为社会理论没有经验科学的那种科学性，因为一旦某种社会理论被人们接受了，人们就会改变他们原先的意义理解和行为方式，以致改变原先的发展路线，从而无法对其做出科学的预言以及证实或证伪。波普尔正是基于这种不确定的互动而否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承认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符号互动的性质，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既然话语交往在人类社会行为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话语交往建立理性的规范或准则。他认为，言语行为在交往过程中经常同时涉及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这三个世界，因此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对一个话语交往的准则进行规定。这三个方面是主观态度上的真诚性、客观事实上的真实性、社会关系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在符号互动的交往中，言谈者的态度要诚恳、开

放、虚心；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要真实、实事求是；交往方式要符合社会规范和伦理准则。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群体中的符号互动行为，需要加以引导，需要建立理性的规范，需要采取民主的方式，遵循民主程序，由此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才能进行合情合理的交流。当然，这跟经验科学的科学预言是有所不同的，它的目的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发现自然规律，而是根据人类行为的意义理解和价值导向的特点提供理性的话语交往的准则，保障人类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

当然，上述的这些批评并不能动摇符号互动论坚持的基本立场，即人是根据意义理解而朝向事物行动的，意义理解产生于当事人与其同伴的符号互动，人在行动和交往的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并不断修正原先的方案和重新解释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活跃着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学派都受到符号互动论的强烈影响，尽管它们看到了符号互动论的不足，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符号互动论阐明一个人的自我观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他在群体生活的联合活动之中面对他人所承担的角色而发生的。这对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自我观形成了强烈冲击，并对舒茨（Alfred Schütz）等倡导的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社会理论提供了支持与激励。舒茨有关自我的观点与米德有类似之处，对胡塞尔的先验论自我观提出质疑。<sup>①</sup>符号互动论阐明了人类社会行为是在彼此交往的符号互动中获得意义理解并做出调整的，这把语言沟通提到了社会研究中特别重要的位置。哈贝马斯承认自己从中得到了启发，于是他把社会批判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他的交往行为理性的学说。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在符号互动中引入了权力的因素，提出了话语权的理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新结构功能论者在帕森斯原有的社会结构功能体系中增添了社会互动的环节，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沟通和意义解释在行为方式和社会秩序产生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化理论，主张社会的结构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把“作为系统”的社会整体结构上的“整合或改造”与“生活世界层面上互动转化联系起来”。<sup>②</sup>由此可见，符号互动论的构想当代社会理论的转型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发酵作用。

（责任编辑：周小玲）

## Social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 Inquiry Centering on H. Blume

ZHANG Qingxiong

**Abstract:**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pragmatism in philosophy, and applied Mead's view on self-identity established through social roles and Dewey's view on theory as a tool to solve life problems within the field of social researc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lf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 in social research, and at the same time intends to maintain the empirical scientific status of social theory. This require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o develop a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meaning interpretation" with "empirical examination". However,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lthough the solution proposed by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s still very preliminary, its conce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Since H. Blume is a central figure i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social concept and methodological step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with Brummer as the center, and evaluates its effects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Keyword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H. Blum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Empirical Examination

① 参见张庆熊：《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以舒茨为中心的探究》，《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② Cf.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131.